方豪與現代中國史學研究的轉變

李 東 華

方杰人先生豪（1910－1980）去世已近十七年。前年五月二十九日台大「方豪教授紀念獎學金」頒獎時，東華秉承師友之命，曾以本論文主題做紀念演講，略述一己體認下的方師史學。當時僅具口述綱目，未能撰述成文。去歲三月底接韓國中國學會邀請參加「第十六屆中國學國際學術大會」，會議主題爲「轉變時期的漢學研究」，因思仍以方師在現代中國史學上之地位爲題，賡續未完成之工作，草成此文，以探索方師（以下概稱方豪，非敢不敬）在當代中國史學轉變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沒有師承的師承

方豪生於一九一〇年（前清宣統二年），正清室將屋之際。其時清末學制教育改革已然施行，科舉被廢，新式學校亦已逐步建立，然新瓶中仍多舊酒，稱其時爲新舊雜陳之時代應不爲過。以方豪所僅受過的中國正規四年小學（當時稱單級國民小學）爲例，即爲舊式私塾改組而成。在民初新舊雜陳的大時代中，方豪以四年小學，十二年天主教修院教育的經歷，不曾受過一天正規史學訓練，卻能在二十餘歲即以傑出的研究成果嶄露頭角，其原因何在？以下幾方面或能有所解答。

(一)自小對歷史的特殊興趣：

據方豪自述，他自小即對歷史有濃厚的興趣，八歲時讀新舊約聖經，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以色列人與埃及人的戰爭最感興趣。同年，其父錫菴公又教以編家譜體例，並購「民國紀元前一百二十年陰陽合璧」一書令其閱讀，深深的啓發了他讀歷史的興趣①。

㈡江浙地區濃郁學術氣氛的薰陶與孕育：

方豪原籍諸暨，爲浙東名邑；母黃氏爲海寧長安人，屬浙西；成長於省城杭州。江浙地區自近世以來長爲我國經濟文化重心所在，浙東尤以史學見長。周予同〈五十年來之中國新史學〉、趙鐵寒〈二十世紀中國新史學〉兩文，都認爲中國現代新史學之淵源與浙東學派關係最爲密切②。浙東學術自清初黃黎州（宗羲）先生創民族主義史學以次，萬季野斯同、全謝山祖望、章學誠實齋等先後相承，亘百五十年之久。乾嘉以降，外患日亟，鴉片戰後，浙東寧波開口通商，此地區又成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薈萃之所。嘉道經世史學之復振，西北及域外史地之崛興，江浙學者均爲中堅。同光以後洋務運動勃興，維新運動甚或革命黨人出自此地區者，更不可勝數。方豪生長其間，雖逢家道中落，未能繼續升學，但以一己求知慾之盛，上進心之強，觀察力之敏銳，孕育於此一優良環境中，所受薰陶自可想像。

方豪只讀過四年正規小學，其餘全爲西洋修道院之教育，但方豪國學造詣甚深。日後能見重於史學和新聞兩界，其文章之練達及文筆之優美實爲根本因素。其國學造詣除自身之努力外，主要得力就讀修院時期之兩位國文老師一潘正始與方同（憲之）先生。方同在甲午戰爭前曾在臺灣擔任幕僚③，應屬國學造詣深厚之「紹興師爺」之輩，方豪堅實之國學基礎，實奠基於此。

㈢民初史學新風潮的追摩：

---

① 參方豪，〈我怎樣走上了學歷史的路〉，《聯合報》副刊，1971年11月4日。

② 周文原載《學林》第四輯（1942年2月），收入杜維運、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台北：華世出版社，1980年），p. 371－428。趙文載李宗桐主編，《二十世紀之科學一人文科學之部：史學》（台北：正中書局，1966年），p. 285－338。

③ 詳見方豪，〈臺灣地方志展覽會特輯摘評〉《文獻專刊》三卷三、四合期（1952年12月27日），p. 85－97。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庫

方豪自十二歲因家庭因素，非入修院不得繼續學業，使他對歷史的興趣受到壓抑。在修院所修習之課程，如拉丁古典文學、士林哲學及多瑪斯派神學等，雖然也曾下功夫研讀，但對日漸具體的中國古文和中國外來宗教史的興趣仍然難以忘情。此後他對歷史的興趣，多半靠自我學習。方豪自謂在修院中「課外喜讀教中先賢傳記」，且從這些先賢行事中，不自覺的吸收了自明以降天主教教士治學的科學方法。而這種近代治學的科學方法所提供的實證研究又是清朝乾嘉考證學與民國新史學的重要根源④。另一方面，方豪所面臨的大環境正是五四運動後新風潮蓬勃發展之時，史學圈亦呈新舊雜陳之現象。方豪個性既然「善於找資料及題目」，自然與北伐後新興之「史料學派」⑤ 結緣。他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和其他同類學報中，努力學習他自稱的「歷史專題研究」的寫作方法。在拜讀了董作賓、傅斯年、陳寅恪、羅常培、趙元任、胡適、陳垣（援菴）、孟森、劉半農等人的文章後，「揣摩又揣摩，學習又學習，窺到了一點門徑」。同時，他開始突破天主教修道院的嚴厲禁令，寫信向史學前輩請益。其中尤以時任輔仁大學校長陳垣覆書鼓勵最爲重要，從此展開了方豪長期書信往還問難的歷程。此後，陳垣遂成爲方豪早期治學的導師，對其研究方向的指引，論文形式之塑造，甚或行文風格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⑥。方豪輒以陳氏私淑弟子自居，而陳氏門人亦以「新會學案」（陳垣籍廣東新會）傳人視之⑦。他在修院期間

---

④ 詳參方豪，〈民國以來的歷史學〉，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以下簡稱《自定稿》），下冊，p. 2169－2184. 他認爲民國以來之史學實於不知不覺中接受了明清之際天主教教士的科學治學方法。清儒受彼輩影響後，本於西洋科學方法研究經學，亟亟於實證之獲得，遂展開了古器物學與古文字學的研究，而這兩種學問也是民國以後史學得以高飛遠颺的左右二翼。

⑤ 有關學派之名稱，周予同首創史觀與史料學派之名。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史學評論》第一期（1979年），p. 1－24，因之。晚近許冠三則又細分爲考証、史料、方法等派（《新史學九十年》上冊，香港：中文大學，1986年）。

⑥ 有關方豪與陳垣間之通信請益，詳見方豪，〈與勵耘老人往返書札殘賸稿㈠〉《傳記文學》十九卷五期（1971年11月），p. 59－66。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有關陳垣治學可參《勵耘書屋問學記：史家陳垣的治學》，北京：三聯書店，1982年5月。最近的研究見李顯裕，《陳垣史學探析》，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6月）。

⑦ 方豪視陳垣爲恩師，可由其與陳垣通信之諸種稱謂與署名中看出。陳氏門人之視方豪，牟潤孫，〈敬悼先師陳援菴先生〉《明報月刊》（1971年10月），p. 16－17一文可爲代表。

的自修與苦讀，伴隨不斷習作的功夫，終使他逐步邁入史學研究的殿堂。

一九三四年五月，方豪自修院畢業，擺脫了長期以來飽受拘束的讀書生活。自此時起，經次年九月十五日在嘉興晉鐸，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抗戰軍興離浙赴滇，前後四年間，他在傳教、教學（曾任杭州小修道院國文教員一年）之餘，集中全力展開讀書寫作生涯，蒐尋資料、發表文章，因而結識之教外人士甚多。天主教中，他亦經常與研究漢學及教史諸神父，如徐潤農、裴化行（P. Henri Bernard）⑧、雷永明（G. Allegia）等相與問學。教外學者，則先後與浙江鄉賢張其昀（曉峰）、陳訓慈（叔諒）等定交，遂使方豪見聞益廣，學殖更厚⑨。同時，因發表文章日多，聲名漸爲人知。一九三八年底到昆明後，更因主編益世報「宗教文化」周刊，得以結識流寓西南諸大家，如陳寅恪、顧頡剛、毛子水、張維華、白壽彝、姚從吾、向達、張蔭麟、方國瑜等先生⑩，經由不斷的請益切磋，終於奠定方豪治史的深厚基礎。

二、方豪治史的特色

方豪因個性及外來影響塑定其一生治史的基調—「歷史專題研究」。最足以表現他對歷史研究看法的是一九四二年他論張蔭麟史學研究的那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對時人推崇張蔭麟「中國史綱」（第一冊）的看法不以爲然，他說：

> 中國史學之不振久矣，外人至誚我國爲無國史之國；余所交歐美學人，往往以介紹一可讀之中國史爲言，誠無以應也，故近二十年來國人對於新國史之期望至殷。雖然，此豈易事？新中國通史之不易完成，史料之整理，要爲一先待解決之問題。……今人之痛詆「歷史專題研究」者多矣，（原案語：近人多喜以考據二字稱歷史專題研究，實爲不當，茲改爲今稱。）或譏爲玩物喪志，或譬爲破碎支離；實則學術研究皆各有其興趣，惟眞沉浸於其學者，始能領略其興趣，沉浸

⑧ 方豪，《李我存研究》自序，收入《自定稿》，下冊，p. 2207－2208。
⑨ 方豪，《李之藻研究》（台北：商務印書館，1966年），自序。
⑩ 參方豪，〈我所認識的姚從吾先生〉《傳記文學》16卷5期（1970年5月），p. 38－42。

既深，自然樂此不疲，樂之至極，乃近於「玩」，但玩物不必喪志；近人貪易就便，懼行險窄之途，見作歷史專題研究者，瘁心勞神爲之，乃譏爲玩物喪志，毋亦太謬乎？若破碎支離，尤爲宇宙必有之現象，有整體必有部分，宇宙奇觀，固合無量數破碎支離之部分而成者也；大廈之立，非資於個個分離之磚木不可，巨器之成，亦非賴個個不同之零件不可。吾人在學術上之貢獻，往往繫於各個人治學之能力與興趣，不量力而爲之，必致無成，反興趣而爲之，亦難期有效，苟其能力興趣近於爲專題之研究，則終身由之可也。作專題研究者，不可無通史之識，而不必有通史之作，有志作通史者，不必爲專題之研究，但不可無專題研究之精神；作專題研究者百，作通史者一，前者不患其多，後者不慮其寡。⑪

這一段爲「歷史專題研究」的辯白，充分說明了方豪反對驟然從事通史工作，並自道其從事「歷史專題研究」的基本看法。

方豪以「史料學派」治史方式爲基礎，不斷從事「歷史專題研究」，可說是他一生治學的主要面貌。除此之外，他的治學還有兩個特點。其一是植根於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的堅定基本立場，其二是所謂「近身之學」的不斷推演擴張。請先言前者。方豪治史是純考據學派風格，很難看出他的民族主義傾向，但從他考據文章以外，尤其是在天主教中所發表的文字，可以看出他具有極強烈的民族主義及中國文化精神⑫。方豪強烈的民族主義及中華文化精神究竟根源於何處，不敢確指。或遠承浙東學術的影響，或受革命傾向甚強父親錫菴公的影響。但由其成長過程及求學經歷中或能得到部分答案。方豪成長過程如其他同時代的中國人一樣，是一個飽受外患欺凌的時代，具有相當程度的民族主義思想，不難想像。更何況他求學過程多置於西方傳教士管制之下，其中辛酸當非常人所能體會。他在修院的教育雖以西學爲主，但

⑪ 方豪，〈略論張蔭麟先生在史學上之成就〉《書目季刊》13卷4期（1980年3月），p. 61～65。該文作於一九四二年張蔭麟先生去世後，但因對張氏史學看法與時人頗有不同，故當時未發表。

⑫ 此類文章極多。如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後，新任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來華履新，方豪兩度（十二月二十日、次年八月九日）在益世報發表社論，重申此意。文見《自定稿》，補編，p. 2761－2767。

臺灣大學圖書館利資料庫

他卻鍾情於中國文史之研究。在修院中文史興趣受外籍神長之壓抑，是他久難平息的心底之痛。隨著中國天主教史認識之加深，他對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利瑪竇、艾儒略輩，以「知識爲信仰之基石」，特重文化傳教之看法，以及當代剛恆毅、雷鳴遠輩尊重中國人與中華文化，並以學術、知識、文化作爲傳教橋樑之外籍教士，深爲佩服。復對天主教史上國學造詣深厚或提倡重視國學諸賢，如清初吳歷（漁山）、時人馬相伯（良）、英斂之（華）、陳垣諸人，極爲嚮往。因此他主張天主教在華傳教應以國人爲主體，外籍教士也應以重視（或尊重）中國文化精神爲傳教之基本態度，最後達到「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最終目標。這是他畢生學術研究的基本立場。此一立場，亦是他在教會內頗受排擠、壓抑，最終甚且寄身學術界的主要原因。

方豪治學的另一特色是「近身之學」的不斷擴張。方豪早年臺大門生章群在〈方豪先生「六十自定稿」讀後感言〉⑬ 中論先生之學云：

> 浙東史學重當代文獻，先生治史則自近身始。身爲教士，則治教士來華傳教史；身在臺灣，則治臺灣史；先生數世居杭，余敢必言，先生治宋史，自南宋臨安始。循此三途，遂造絕峰。

以個人對方師治學之體會，這是一針見血之論。方師自入修院以後，接觸天主教資料漸多，對杭州一帶教會史蹟尤爲注意，遂因而及於明末名列公教三大柱石中之兩位杭州先賢李之藻（我存）、楊廷筠，並因此展開了方豪研究天主教史與浙江鄉土史的序幕。從天主教史來說，不論唐代之景教、元時之也里可溫、明清之天主教都屬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內容；從浙江鄉土史來說，方豪生長的杭州灣地區，自唐宋以來長爲中外文化薈萃之所，到處都散布著中外交通的史蹟，方豪之研究中西交通史明顯是天主教史及浙江鄉土史兩項近身之學的導引。

從後來方豪治學另一主要研究範圍—宋史來看，也是如此。方豪對宋史的研究興趣起源甚早，但眞正的從事研究則遲至來台後才展開。章群說：

---

⑬ 載《方杰人院士蒙席哀思錄》（台北：政大，1981年12月，以下簡稱《哀思錄》），p. 193－1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先生治宋史，自南宋臨安始」是不錯的，蓋方豪早年既對浙江鄉土史有興趣，自幼生長杭州，徜徉於南宋臨安都城中，廣見古蹟，自然會引發他對宋史研究的興趣。方豪在爲李安《岳飛史蹟考》⑭ 一書作序時說：

> 念余之以繼中西交通史而又兼治宋史者，……臨安之前塵昔夢…所以啓發余者，尤爲深遠。

說得極爲明白。

方豪治史的第三個重要範疇台灣史，更是他近身之學發揮的極致。由於方豪特別注意週邊近身事務，因此抗戰期間旅居昆明、遵義及重慶時，都有相關於當地的研究成果。一九四九年來台後，正趕上台灣光復後台灣史研究的熱潮，乃傾全力蒐集台灣史料，進入台灣史研究的領域，對近身之學一鄉土史地的研究再度發揮。其後因居住長達三十年，其持續研究台灣史之成果亦最輝煌。方豪曾說：

> 豪不敏，十九年前甫履斯土，即視斯土爲第二故鄉，視台灣文獻爲余之鄉邦文獻⑮。

又說：

> 余外省人也，熱愛本省文化，不讓本省同胞，以所居時期之短暫言，此爲余第二故鄉，但以余在地方文獻上之效力言，此實爲余第一故鄉。

可說是他研究台灣史心情的最好証明。

---

⑭ 見李安，《岳飛史蹟考》，再版序，載《東方雜誌》4卷3期（1970年9月），p. 51。

⑮ 見方豪，《臺灣方志彙編》序，（台北陽明山：國防研究院，1968年），收入《自定稿》，下冊，p. 2313－2315。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歷史資料庫

三、史學研究轉變下方豪的處變

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易手。方豪因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卓越表現，爲史料學派領航人初任台大校長的傅斯年所賞識，應聘到台大歷史系任教。同時，史料學派大本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亦因傅斯年的安排，得以完整播遷到台灣，部分學者並應聘至台大任教，史料學派遂成爲其後台灣史學研究的主導力量。方豪沉浮其間，有如魚得水之樂。但在客觀環境的孕育下，臺灣史學研究與教學方向出現了大的轉折。首先是因時局的刺激，多數歷史學者自省，對史料學派以考訂史料及研究古史爲主流的治史態度深表不滿，認爲他們只考訂個別歷史事件，不以通史寫作爲急務，不以史觀爲急圖的歷史研究態度，是導致歷史教育失敗、時局發生變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他們重視古代史，輕忽近、現代史的研究態度，也造成時人知古不知今的弊端。在社會輿論壓力下，主政當局主動提倡近代史之研究⑯，這是來自時代與環境的影響。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則是來自史料學派內在的危機。史料學派是以蒐尋、考訂史料爲主要研究工作，到台灣後由於客觀環境的轉變，主要研究領域—中國史喪失了「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環境，時間一久，沒有新史料的支持，史料學派的研究取徑自然就要動搖。用傅孟眞的話來說：「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⑰，這是史料學派逐漸式微的最主要因素。第三個因素，則是歐美二次大戰後新史學思潮的輸入，這些提倡歷史相對論，主張歷史研究應重「疏通」、「解釋」之觀念，漸透過留學歐美年輕學人之歸國而逐漸產生史學觀念上的改變，進而帶來史學研究方法上的轉變，均助長了腐蝕史料學派的力量⑱。

在這個轉變的時期，方豪顯現了天生「史料學派」健將的性格。首先，雖然方豪自知他「習慣作專題研究，對於通史性質的著述，絕非所長」。但

---

⑯ 一九五二年教育部列中國近代史爲大學必修課程。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遷台後開始編輯出版史料—《革命文獻》。一九五五年二月在中央研究院籌設近代史研究所均爲例證。

⑰ 見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載《史語所集刊》第一本（1926年）。

⑱ 詳參拙作，〈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載《海峽兩岸學術研究的發展》（台北：聯經，1988年），p. 65－83。

在遷台初期極端缺乏大學中國史教科書的環境下，他撰寫了「宋史」（兩冊）、中西交通史（六冊）、及中國近代外交史（第一冊）等三本通論性的著作，論者認爲至今仍爲重要教科書。其次，前述「近身之學」特性的發揮，他傾力研究台灣史，得以就地取材開闢新的研究領域，成爲內地學人轉移研究領域最成功的人，也令其能繼續發揮史料學派的研究方法。在「中西交通史」方面，他把研究重心轉移至東南沿海之海外交通史，如有關泉州對外交通、鄭和下西洋等問題上，一方面可與台灣史接榫，另一方面更可擴大其舊有研究領域，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中走出一條活路來。方豪曾數度趁出國之便，瀛寰訪書，尋得有關中西交通史及台灣史之珍貴材料，如有關明末呂宋華僑社會之史料及清代台灣各種方志資料等。他這種突破困境，努力蒐集史料，研究方向復隨史料而遷的精神，充分彰顯了「歷史專題研究」學派「史料至上」的研究特徵，更爲傅孟眞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做了最佳的注腳。因此，方豪在遷台後逐漸不利於「史料學派」研究的轉變時期，非旦未曾出現一般學者抱殘守闕的窘況，且在新舊研究領域中都有遊刃有餘的表現，爲艱困的史料學派隊伍繼續擎旗斬將，攻城掠地，故方豪在此一轉折時期所扮演的角色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四、方豪的治學成績

方豪治史，成績斐然。生前曾自刊《方豪文錄》（1948 年）及《方豪六十自定稿》（兩冊，1969 年）兩文集。生平著述目錄亦有〈方豪（杰人）教授著作年表〉⑲ 可供查考。此處僅就其研究主要領域：中國天主教史、中西交通史、臺灣史及宋史四方面，簡述其研究成果與地位。

在中國天主教史方面，方豪以教士治教史，早有整理教史之志。但因時局困扼，資料失散，致後來喪失完成中國天主教史之雄心。但他仍有《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巨著三冊⑳ 行世。一九四五年中日戰爭結束，陳垣曾致

⑲ 〈方豪（杰人）教授著作年表〉原刊《史原》第九期（台大歷史研究所，1979 年）。後又收入《哀思錄》，略有增補。

⑳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前二冊，香港：公教眞理學會，1970 年 9 月。第三冊，台中：光啓出版社，1973 年 12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書方豪，有云：

> 公教論文，學人久不置目，足下孤軍深入，一鳴驚人，天學中興，捨君莫屬矣！㉑

期許獎飾之深，容或有過，但方師之治天主教史㉒，及其本身對中國天主教之貢獻，均有不容磨滅的地位。

在中西交通史方面，論者謂方豪私淑恩師陳垣爲一代宗師，其所著述，固自不朽；張星烺彙集史料，不遐考索；向覺明（達）局於中古；馮承鈞偏於南海，章鴻釗偏於金石，二人同以譯證爲主㉓。方豪則由教史進入此一領域，以迥異常人之外文基礎（拉丁文及法文），乃能出類拔萃，成爲個中翹楚。加以因緣際會，遷居台灣，乃得完成《中西交通史》六冊巨著。其後著述不輟，轉較留居大陸之陳垣、向達輩幸運。晚年有關十六、十七世紀呂宋華僑社會之種種研究，尤爲其中西交通史研究壓軸之作。

有關宋史研究，方豪除著有《宋史》（兩冊，1954年）㉔ 外，其它研究成果亦十分豐碩，其中尤以有關宋代佛教之研究貢獻最大㉕。他透過宋代佛教對造橋、造紙及印刷、繪畫、書法、水利設施、旅遊、栽茶及史學的貢獻，來討論佛教與宋代社會及文化的關係，進而肯定宗教對社會文化的影響與價值，是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此外，他對台灣地區宋史研究的倡導與啓迪亦功亦不可沒。方豪在台灣大學教授宋史前後逾三十年，並於一九五八年與研究宋史之同好組織「宋史研究會」（日後更名爲「宋史座談會」），不

㉑ 見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p. 306，12月1日函。

㉒ 有關方豪在中國天主教史研究中的地位，詳見黃一農，〈明末清初天主教傳華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新史學》7卷1期（1996年3月），p. 143～144。

㉓ 見章群，〈方豪先生「六十自定稿」讀後感言〉，p. 194。

㉔ 該書由中華叢書出版委員會出版，現歸華崗出版社。論者謂爲「民國以來第一部涵蓋面廣而又詳盡的通論性宋史著作」。見梁庚堯，〈方杰人師對宋史研究的貢獻〉，載《哀思錄》，p. 161～165。

㉕ 有關論文有〈宋代僧侶對於栽茶之貢獻〉、〈宋代佛教對社會及文化之貢獻〉、〈宋代僧徒對造橋之貢獻〉、〈宋代佛教對中國印刷及造紙之貢獻〉、〈宋代佛對繪畫之貢獻〉、〈宋代佛教對書法之貢獻〉、〈宋代佛教對史學之貢獻〉、〈宋代佛教徒西行求經與譯經之成就〉、〈宋代佛教對泉源之開發與維護〉、〈宋代佛教對旅遊之貢獻〉、〈宋代佛教建築舉隅〉、〈宋代佛教與遺骸之收瘞〉等。

臺灣大學學術

定期舉行有關宋史之學術討論會。一九六〇年代以後，臺大老一輩學人逐漸退休、凋謝，方豪以盛年成爲當時重要教授，指導研究生研究宋史者極多，宋史一時竟成顯學，當時學子至今多已卓然成家。其中如任教臺大的林瑞翰、王德毅、趙雅書、梁庚堯，任教清華的張元、黃敏枝等，皆爲其門生。方豪在宋史研究人才的培育之功，似乎較其本身的研究成果貢獻更大。

最後是有關臺灣史之研究。一九四九年方豪來台後，投身臺灣史研究，主要工作集中在散佚各地臺灣漢文文獻的訪求和研究。短短幾年中，他先後從史語所藏書中發現不爲臺灣史學界注意的《恆春縣志》，至日本內閣文庫及東京大學取得《閩海贈言》及高拱乾撰《臺灣府志》影本，並在美國柏克萊加大訪求《臺灣外志》新抄本等。同時又校刊郁永河《裨海紀遊》，考證陳第《東番記》等，晚年又尋得記載臺灣割讓日本前夕情況的史久龍《憶臺雜記》一書。對擴展臺灣史研究的廣度與深度，都有一定的貢獻。省籍臺灣史耆宿楊雲萍教授追悼方豪文曾云：

> 尤其是對於臺灣史史料的發現、研究和校刊，將與臺灣的河山同其不朽㉖。

推崇可謂備至！

除了史料的發現、研究和校刊，方豪有關臺灣史的專題研究，也有值得注意者，其中有關「郊」的研究，即被視爲具有開創性以及貢獻最大的論述㉗。晚年，方豪也有寫作臺灣史通論性著作的計劃，可惜只完成了荷蘭、西班牙占領臺灣時期以前的部分。這就是臺灣學生書局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臺灣早期史綱》一書，代表他對早期臺灣史的最後見解。

五、結　語

方豪一生毫無疑問是史料學派陣營中的一員健將。他遠承明清之際西洋

㉖ 見楊雲萍，〈方杰人先生安息〉，載《哀思錄》，p. 57－58。

㉗ 參許雪姬，〈方杰人教授對臺灣史研究的貢獻〉，見方豪《臺灣早期史綱》（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年），附錄，p. 223－232。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教士治學的科學方法，近接當代實證主義者胡適之「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之考據癖，一生服膺歐陸科學史派傳人傅孟眞「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的箴言，復自乾嘉考據學傳人陳援菴習得「采山之銅」、「竭澤而漁」的功夫，益以本身過人的外文基礎，豐贍的教史知識，樂此不疲的長期從事「歷史專題研究」的寫作，累積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在本世紀三、四十年代「史料學派」主導中國史學界時，他浮沉其中，自得其樂。當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易手，「史觀學派」隨之吞噬了整個大陸史學界，史料學派主流來臺灣後，亦因前述種種因素的影響而日趨式微。在這關鍵的轉變時期，方豪發揮其「近身之學」及蒐尋史料的超人功夫，開拓出一條新路，撐持捍衛「史料學派」的陣營。從這個角度來看，個人認爲方豪是史料學派理論最佳的闡釋者與實踐者，稱其爲臺灣，甚或中國，史料學派的最後一人亦不爲過。他所贏得的「新會學案第一傳人」[20] 雅譽，實當之無愧！

（後記：本文在1996年8月韓國中國學會主辦之第十六屆中國學國際學術大會中宣讀，原定發表於本年8月出版之韓國中國學報第37輯，該學報在台銷行不廣，爰再發表於本系學報，以向國內學者請教。）

[20] 見牟潤孫，〈敬悼先師陳援菴先生〉，p. 16－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